

邹萍——著

# 诗性正义

当代西班牙内战小说中的  
历史与记忆

 复旦大学出版社



# 诗性正义

当代西班牙内战小说中的  
历史与记忆

邹萍——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性正义:当代西班牙内战小说中的历史与记忆/邹萍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3.5

ISBN 978-7-309-16701-6

I. ①诗… II. ①邹… III. ①小说研究-西班牙-现代 IV. ①I551.074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015016 号

诗性正义:当代西班牙内战小说中的历史与记忆

邹萍 著

责任编辑/杜怡顺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102580 团体订购: 86-21-65104505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268 千

2023 年 5 月第 1 版

202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6701-6/I · 1348

定价: 58.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绪 论	001
-----	-----

## 上篇 概 观

第一章 历史的记忆书写	019
第一节 历史与记忆的关系	020
第二节 从集体记忆到“记忆之场”	029
第三节 文化记忆与记忆的文学再现	039
第二章 西班牙内战的记忆书写	057
第一节 西班牙内战的历史与记忆	058
第二节 记忆“爆炸”与记忆危机	075
第三节 内战记忆小说的概念界定与再现模式	089

## 下篇 见 证

第三章 记忆书写的伦理意义	111
第一节 概述	111
第二节 《我现在诉说的名字》中的叙事艺术与伦理向度	115
第三节 《盲目的向日葵》中的记忆书写与伦理意义	132
第四章 记忆书写与空间	148
第一节 概述	148

目 录	001
-----	-----

第二节	《波兰骑士》中的记忆书写与时空隐喻	153
第三节	《冰冷的心》中的家族空间与民族纪事	170
<b>第五章</b>	<b>记忆与媒介</b>	190
第一节	概述	190
第二节	看见记忆的风景：《月色狼影》中的自然景观与历史书写	196
第三节	听见记忆的声音：《沉睡的声音》中的听觉叙事	214
<b>第六章</b>	<b>记忆书写的“跨界”</b>	239
第一节	概述	239
第二节	记忆的“侦探”——《萨拉米斯士兵》中的叙事策略	244
第三节	侦探的游戏、历史的迷局——《邪恶的人四处行走》中的 隐性进程	259
<b>第七章</b>	<b>记忆的解构</b>	274
第一节	概述	274
第二节	“坏记忆”？“好记忆”？——《又一本该死的内战 小说！》中的解构与建构	279
第三节	元小说的迷宫游戏——《昨日无用》中的戏仿与真诚	296
<b>结 语</b>		312
<b>参考文献</b>		321
<b>后 记</b>		348

## 绪 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记忆”研究在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甚至是绘画、音乐、雕塑等艺术领域不断升温,直至形成一个巨大的场域,吸引着各类问题和不同学科经由记忆在此交汇、聚合、碰撞。今天,记忆研究俨然已经成为最为热门的跨学科命题之一。

这或许并不意外,在古希腊神话里,“记忆”就被描述成一个神秘且强大的形象——记忆女神摩涅莫绪涅(Mnemosyne),她与宙斯结合,诞下了包括掌管着英雄史诗的卡利俄佩(Calliope)、历史女神克利俄(Clio)等9位女神。这不仅彰显了记忆在古希腊文化中至高至上的地位,更生动形象地展示了记忆与作为整体的文化,尤其是记忆、历史、与叙事之间由于同源共生而天然具备的亲密关系。的确,在历史于19世纪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前,英雄史诗、口述记忆一直是历史的同义词。历史是我们获得有关过去知识的重要途径,记忆也同样让我们向过去频频回首,正如雅斯贝斯(Karl Jaspers, 1883—1969)指出的:“对于我们来说,历史是记忆。我们不仅懂得记忆,而且还根据它生活。如果我们不想化为虚无,而想获得部分人性的话,历史就是奠定了的基础,我们继续受它束缚。”<sup>①</sup>应当说,历史与记忆之间既彼此依赖,又有着立场和视域的区别,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无论是将历史和记忆等同起来,还是将它们区别看待,都有可能成为争论焦点的原因。

---

<sup>①</sup> [德] 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65页。

但毋庸置疑的是,围绕着二者关系的讨论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涵,凸显了记忆,尤其是个人记忆对于人们了解过去、反思自身,以及审视历史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在今天,口述记忆、日记本、私人照片、家族往事等已经成为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依据。“历史—记忆”关系的讨论也逐渐成为一个多元开放的问题空间,有人批判地将它们的关系对立起来,认为历史是“抽象的、总体化的、死亡的”,而记忆是“个别的、有意义的、活着的”<sup>①</sup>;也有人在二者交互变化的关系中,不断思考和开拓新的研究命题和阐释方法。

现代意义上将“记忆”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的,是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20世纪20年代,他开创性地提出“集体记忆”的理论,阐释了“记忆的社会框架”的概念,论证了个人记忆必然受到不同社会文化语境的作用和形构。在历史与记忆的关系问题上,哈布瓦赫主张将二者区别看待,以凸显集体记忆对于一个群体身份延续的重要性。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研究将记忆从精神、心理层面带入到社会层面,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法国兴起的“记忆之场”的研究,以及扬·阿斯曼夫妇提出的“文化记忆”理论都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前者将自己置身历史与记忆的间隙之中,后者则打通历史与记忆间的壁垒,将其看作具体社会文化语境下的不同记忆的模式。总之,有关记忆的命题与讨论离不开“历史—记忆”这一对双重变量自身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探讨。

应该说,“记忆”研究在西方社会的兴起与20世纪复杂曲折的历史进程不无关系。两次世界大战、原子弹、集中营、独裁、流亡、冷战、越南战争……在人类文明经历着摧毁性的灾难和创伤之时,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历史的发展变化,尝试寻求新的解释。因为“自从启蒙运动

---

<sup>①</sup> Maurice Halbwachs; *The Collective Memory*.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Books, 1980, p.78.

以来西方社会所依靠的那些乐观的假设受到了挑战,他们对科学、进步和现代性的信仰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已经极大地动摇了。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在历史编撰学的方法上”<sup>①</sup>。换言之,人们意识到历史的发展并非总是线性地向前,科学和理性也并不能为所有问题找到解决方法,这时回首过去就成为必然。史学研究的范畴也因此延伸至那些非理性的、情感的、小写的、微观的历史和记忆。在这样的必然之下,推动了这场记忆热潮兴起的另一个偶然原因,是 1961 年令全世界瞩目的艾希曼(Eichmann)大审判,这场审判带来的争议和对大屠杀事件(Holocaust)的挑战,让人们意识到大屠杀的幸存者和见证人正在不断减少,要使这一历史事件获得公正的评判,首先要让它不被遗忘。记忆于是成为历史的“支点”<sup>②</sup>。

不难发现,此时成为公共话语聚焦点的“记忆”,一方面,以受害者的记忆、苦难记忆、创伤记忆为主要内涵;另一方面,则以记忆与见证,记忆与认同,记忆与伦理,记忆与民族同一性建构等因素之间的密切关联为重要外延,这也构成了 20 世纪末期记忆研究的一大特点。在法国,大革命、“一战”等造成的创伤深深印刻在人们的记忆里,而法国的历史研究传统是将历史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紧密挂钩,同时高举“科学”和“实证”的大旗。<sup>③</sup> 官方历史对一些创伤和问题的刻意回避,逐渐引起公众的不满。如何正确认识和评判自己民族的历史,成为包括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等在内的众多民众共同关注的问题。他们在不同领域对此进行着探索和回应,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史学家皮

---

① [美]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3 页。

② [法] 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08 页。

③ 沈坚:《记忆与历史的博弈:法国记忆史的建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 年第 3 期,第 207 页。

埃尔·诺拉(Pierre Nora, 1931—)提出的“记忆之场”的概念,希望“通过碎化的和独立的‘记忆场所’研究来破除民族神话,颠覆神圣化的法国史,对抗纪念式的历史”<sup>①</sup>,重塑法国人民的民族史观。“记忆之场”不仅强化了记忆与空间之间的联系,更将传统历史主义的视角转向了记忆的视角。随着诺拉和“记忆之场”的影响力的扩大,7卷本的《记忆之场》也已经成为法国人民建构民族认同的“场所”。记忆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划时代地来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德国,阿斯曼夫妇发展提出“文化记忆”理论。作为对哈布瓦赫的批判式继承,他们区分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前者的保存时效较短,大约在八十年即三代人左右。因而如果仅凭“交往记忆”或者说日常记忆,那么随着见证者的不断离世,历史被世人所遗忘势必无法避免。但“文化记忆”则不然,它可以通过有效稳定的文化形式——档案、仪式、纪念碑等,以及专业的机构和人员,将这段记忆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保存、固化下来。不仅如此,正如上文已经提及的,文化记忆打通了“记忆”和“历史”的壁垒,“神话和历史的区别消失了”,在文化记忆的视阈下,“重要的不是过去本身,不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调查、重构出来的那种过去,而仅仅是被记住的那种过去”<sup>②</sup>,因此文化记忆尽管也回望过去,但更加关注过去如何对当下产生意义和作用,即记忆的认同功能。

1995年,在《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一文中,扬·阿斯曼总结了“文化记忆”所具有的六大特征:第一,“‘身份固化’或群体关系”(“the concretion of identity” or the relation to the group),文化记忆储存知识,一个群体从中获取关于自己的整体性和独特性意识;第二,“重

---

<sup>①</sup> 沈坚:《记忆与历史的博弈:法国记忆史的建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第216页。

<sup>②</sup> [德]扬·阿斯曼:《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载[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安斯加尔·纽宁主编:《文化记忆研究指南》,李恭忠、李霞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42页。

构能力”(capacity to reconstruct),记忆无法将过去一成不变地保存下来,被保留的是每个时代的社会在其当代的参照框架中能够重构的东西,文化记忆则从当下通过重构来发挥作用;第三,“形构”(formation),文化记忆以稳定的形式——语言、图像或是制度化的仪式,将知识固化下来,然后以社会遗产的形式进行传播;第四,“组织”(organization),文化记忆通过规范化、机构化的庆典以及专业的人员来进行专门的记忆实践;第五,“义务”(obligation),文化记忆拥有明确的意义和价值体系;第六,“反思性”(reflexivity),文化记忆具有反思的能力,包括对个人自身或对集体进行反思。<sup>①</sup>这六大特点,即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象征与文化记忆、文化参与者的责任、记忆的反思义务,记忆与价值取向的关系等,实际上构成了“文化记忆”理论框架下,记忆运行机制的几个重要环节。只有通过彼此之间的有机联动,才能使“包含某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所特有的、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向系统、仪式系统”<sup>②</sup>的整个“文化记忆”体系有组织地运转,使历史和文化在世代交替中获得稳定性和连贯性。

显而易见,无论“集体记忆”理论、“记忆之场”,还是“文化记忆”机制,都将记忆的社会属性,即记忆如何在群体的交互中发挥功能、实现价值视为核心问题,而达成这一目标的前提就是记忆的再现和表征。哈布瓦赫在论及语言和记忆的关系时,以罹患失语症的人为例,认为他们由于丧失了语言交流能力,切断了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交换通道,导致记忆的社会框架“损毁变形”,最终造成他们的“记忆的领

---

<sup>①</sup> Jan Assmann: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New German Critique*, n°. 65, *Cultural History/Cultural Studies* (Spring — Summer), 1995, pp.130-132.

<sup>②</sup> [德]扬·阿斯曼:《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陶东风译,载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4页。

地都非常典型地变小了”。<sup>①</sup> 也就是说，“回忆是在与他人及他们的回忆的语言交流中构建的。我们回忆许多我们能找到机会去讲述的东西”。<sup>②</sup> “讲述”是一种语言符号的编码，不仅能够存储记忆，更能够通过“重复”<sup>③</sup>巩固记忆，使其在当下的文化意义系统中始终保持在场。

文学文本以其强大的语言建构能力，在记忆的塑造、存储和流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虚构真实、制造记忆是作家们的合法特权，通过巧妙的语言修辞，文学文本能够“塑造某种关于过去的集体想象”<sup>④</sup>，并且那些经典、优秀的文学文本所生产出的携带共情能力的想象，无论是在保存时间和传播范围方面，抑或是在对人们潜在记忆的触动和激发上，都表现出比其他记忆媒介更为卓越的优势。这一点在民族创伤记忆的再现上尤显突出，我们经常见到，那些无法经由正常官方渠道得到表征的历史事件，通过文学创作变得鲜活而真实。于是，阿斯特莉特·埃尔(Astrid Erll)以战争小说的构造为例，总结出四种文学对记忆的再现模式。第一种是以第一人称叙事、意识流、保留方言特色等叙述方法，来模拟真实记忆效果的体验型战争小说；第二种是以神话或圣经中的故事为原型，通过隐喻、象征、互文指涉等手法来再现某一历史事件的神话型；第三是通过叙事视角的选择，将与自己冲突的记忆文化的成员所表达的版本，解构为虚假的对抗型战争小说；以及通过上述三种、或其他模式建构过去的同时，对这一再现过程展开批判性反思的反思型小说。<sup>⑤</sup> 埃尔经由对文本与集体记忆之间

---

① [法]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6页。

② [德]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的真实性》，王杨译，载[德] 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9页。

③ 同上。

④ [德] 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学、电影与文化记忆的媒介性》，载[德] 阿斯特莉特·埃尔、安斯加尔·纽宁主编：《文化记忆研究指南》，李恭忠、李霞译，第389页。

⑤ 同上书，第485—487页。

的互动和转换的剖析,证明通过一定的艺术创作过程,小说可以同时成为文化记忆的对象和媒介。而如何成为以及为什么能够成为这样的记忆媒介或对象,也是我们在本书中始终关注的重点。

对于同样在近代史上经历了巨大战争创伤的西班牙来说,自 20 世纪末持续到现在的历史记忆的追溯热潮更多地体现在文化层面。作为欧洲大陆上唯一在“二战”后建立了法西斯政权的国家,长期以来,西班牙社会都在集体履行着所谓的“沉默契约”<sup>①</sup>。佛朗哥政府在 1939 年至 1975 年的独裁统治,迫使“沉默”和“遗忘”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或曰生存方式。官方历史对记忆的改写、严苛的文化审查,让经历过的和未曾亲历的西班牙人,都极难触碰到这场战争的真实模样。直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佛朗哥政权进入尾声,高压策略显松动,年轻的一代才能偶尔通过国外作家以不同体裁——历史、自传、小说等书写的内战历史<sup>②</sup>,生平第一次了解到有关这场民族之殇的其他版本。

1975 年至 1982 年,西班牙进入民主过渡阶段,迫切需要缓和政治矛盾、避免武装冲突,以通过平稳民主转型尽快适应现代西方社会的节奏。1977 年政府颁布《大赦法》(*the Amnesty Law*),释放了在佛朗哥统治期间被逮捕的人们,但同样也使曾经为法西斯政府服务的人合法地避开了法律的审判,于是,关于内战和战后的记忆被彻底空悬。这

---

① Txetxu Aguado: *Tiempos de ausencias y vacíos: Escrituras de memoria e identidad*. Bilbao: Universidad de Deusto, 2010, p.27.

② 在这一时期想要比较客观、全面地了解有关西班牙内战的面貌,主要依靠来自国外的相关历史著作,例如英国历史学家、作家休·托马斯(Hugh Thomas, 1931—2017)于 1962 年出版的《西班牙内战》(*The Spanish Civil War*);美国历史学家、记者加布里埃尔·杰克逊(Gabriel Jackson, 1921—2019)在 1965 年至 1975 年间创作的多部与内战有关的专著,比如 1965 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班牙共和国与内战: 1931—1939》(*The Spanish Republic and the Civil War 1931—1939*)等;此外,还有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 1901—1976)根据自己在内战中的亲身经历创作的小说《希望》(*Man's Hope*, 1937);法国作家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 1888—1948)于 1938 年出版的《月色下的墓地》(*Les grands cimetières sous la lune*)等叙事作品。

一阶段,随着文化审查制度的取消,历史小说热再度兴起,涉及内战的小说多达百余部。<sup>①</sup>但由于此时的政治导向及主流思潮是“遗忘”“和解”和“向前看”,于是那些不必站在任何一方的实验小说,或巧妙避开棘手问题的侦探小说,显然更受欢迎。故此,在民主过渡阶段,内战小说尽管数量显著增长,但由于未能在读者中引起充分回应,以及没有得到再版和广泛传播,因而还不足以形成重塑或反思集体记忆的一种话语建构。

实质性的变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西班牙国内政治逐步稳定(顺利完成民主转型)、经济有序增长(加入欧共体)、国际影响力渐渐恢复(成功申奥)等一系列有助于加强民族意识举措的实施,加之彼时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记忆之场”“文化记忆”等热潮,包括大屠杀记忆引起的,对战争幸存者的关注等一系列因素,促使半个世纪以来被埋葬、被回避的内战记忆,在21世纪初再次成为政治文化语境下、包括叙事文学在内的聚焦点。文学批评家波苏埃洛·伊万科斯(Pozuelo Yvancos, 1952—)将其原因归纳如下:

首先,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们的自我意识显著加强,个人记忆、被讲述的经历和“我”的见证,在当下西班牙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显得愈发重要,这一心态与大量以第一人称展开叙事的西班牙小说尤显契合;其次,近年来,历史小说再度获得青睐,从整体上对内战题材的叙事文学形成了一种推动;再次,从文化社会学角度而言,内战是一段刚刚过去的历史,并且正在西班牙政治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众多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比如大量还未公开的万人坑,使这一在民主过渡时期被置于真空状态的敏感话题,在当下时而成为公众

---

<sup>①</sup> Mar Langa Pizarro: “La novela histórica española en la transición y en la democracia”, en *Anales de Literatura Española*, n.º.17, 2004, p.111.

争论的焦点,时而化身政治角力的砝码;最后,就内战这一历史事件本身来看,它的范围波及西班牙全国,每一寸土地,每一个家庭,无一能够幸免其难、置身事外。对于小说家们而言,这段具备了所有伟大文学所需的三要素——偶然性、英雄史诗和悲剧色彩的历史,无疑是吸引着作家们不断深耕的创作沃土。<sup>①</sup>

其中,一批出生于内战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被称为“孙辈”<sup>②</sup>的内战后的第三代作家们,他们未曾亲历战争的残酷,在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一方面是被官方历史强加的关于过去的认知,另一方面则是碎片化、模糊不清的,来自父辈们的另一种内战记忆。两种记忆激发的矛盾和疑惑迫使成年后的他们不断追问:“我是谁?”或“我们是谁?”被阻断的记忆使这些知识分子既无法从过去找到身份的归属,也无法从当下获得相应的集体认同,因而有学者将其称为“文化孤儿”<sup>③</sup>。相应地,他们的内战书写也呈现出和上一代作家不同的特点:

第一,他们以“后记忆”(post-memory),而非个人直接记忆的形式,通过“想象和创造”,表征与思考“后代与先辈们的个人创伤、集体创伤和文化创伤的关系”<sup>④</sup>;第二,作为后代的他们对这场战争并无直接痛苦体验,因而敢于用书写去“揭开伤疤”,去触碰造成民族苦难的根源,且毫不畏惧这种行为裹挟着的道德责任,例如《邪恶的人四处行走》对佛朗哥时期丧失人性的盗童案件的揭露;第三,他们通过记忆的再现建立起当下与过去的关联,通过记忆的反思呈现历史记忆对于个

---

① 参见 José María Pozuelo Yvancos: *Novela española del siglo XXI*. Murcia: Universidad de Murcia, 2014, pp.294-297。

② Hans Lauge Hansen, Juan Carlos Cruz Suárez: “Literatura y memoria cultural en España (2000-2010)” en *La memoria novelada (vol.I)*, ed. por Hans Lauge Hansen, Juan Carlos Cruz Suárez, 2012, p.31.

③ José Carlos Mainer, Santos Juliá: *El aprendizaje de la libertad 1973-1986: la cultura de la transición*.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2000, p.124.

④ Marianne Hirsch: *Family Frames: Photography, Narrative, and Post-mem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2.

体或集体身份建构的重要性,整体上表现出对“沉默契约”及其后果的对抗和反叛;第四,作为年轻一代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体现出围绕记忆的新的审美之思,在追溯内战历史的同时还具有“描绘记忆如何运行的文学性”<sup>①</sup>;第五,他们的创作大都十分畅销,不仅获奖无数,许多还被改编成电影,在国内外收获大批读者和观众。于是作品被出版社频繁再版,被学者们不断评论和阐释,也激发了更多同类型、同题材的作品的出现,共同聚集、凝结成为有关民族记忆和身份的“可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sup>②</sup>。例如2021年,《萨拉米斯士兵》在距离首次出版二十年后被引入中国市场,可见这部作品持久稳定的可记忆性。

这一文学现象自21世纪初便受到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安娜·卢恩戈(Ana Luengo)、何塞·科尔梅罗(José Colmeiro)、科雷德拉·贡萨莱斯(Corredera González)、乔治·提拉斯(Georges Tyras)、戈麦斯·洛佩斯·奎诺内斯(Gómez López-Quiñones),以及上文刚刚提到的波苏埃洛·伊万科斯等人的研究著作。

2004年,安娜·卢恩戈在《记忆的十字路口:当代小说中西班牙内战的集体记忆》(*La encrucijada de la memoria: la memoria colectiva de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en la novela contemporánea*)一书中,以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和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为基础,以穆尼奥斯·莫利纳的《波兰骑士》(1991);拉法埃尔·契尔柏斯的《马德里的沦陷》(2000);哈维尔·塞尔卡斯的《萨拉米斯士兵》(2001)等5部作品为研究对象,分析它们如何从不同视角再现和反思西班牙内战时期的历史,并由此得出结论:当代西班牙内战题材小说有利于一个民族完善

---

① [德]柏吉特·纽曼:《记忆的文学再现》,载[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安斯加尔·纽宁主编:《文化记忆研究指南》,李恭忠、李霞译,第414页。

② [德]扬·阿斯曼:《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陶东风译,载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第4页。

甚至重构其历史记忆。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何塞·费尔南多·科尔梅罗的专著《历史记忆与文化身份：从内战后到后现代》(*Memoria histórica e identidad cultural: de la postguerra a la postmodernidad*, 2005)中提出,佛朗哥政权在内战后对集体记忆的操控,和民主过渡时期政府与人民间达成的“沉默契约”,是造成今天西班牙人民历史记忆缺失和文化身份危机的主要原因。达特茅斯学院戈麦斯·洛佩斯·奎诺内斯的专著《永不休止的战争——记忆、暴力、乌托邦:西班牙内战在当代的呈现》(*La guerra persistente. Memoria, violencia, utopía: representaciones contemporáneas de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2006)从三个角度:历史在当下不同媒介形式中的表现、文学作品中的暴力表征,以及对第二共和国的乌托邦想象,分析了16部以内战为题材的小说和电影,尤其强调政治因素对记忆的影响而造成过去的不可靠,使其成为一个必须永远探索下去的永恒的课题。同样来自达特茅斯学院的特克斯苏·阿里多教授在著作《缺失的年代:记忆与身份书写》(*Tiempos de ausencias y vacíos: escrituras de memoria e identidad*, 2010)中则以当代西班牙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战小说作为研究对象,阐释了文本作为记忆的媒介对于一个民族的记忆重构和身份认同的重要影响。玛利亚·科雷德拉·贡萨莱斯在《当代小说中的西班牙内战:不同年代的沉默与对话》(*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en la novela actual: silencio y diálogo entre generaciones*, 2010)中以安东尼奥·索列尔的《我现在诉说的名字》(1999)、爱德华多·苏尼卡的《荣耀之都》(2003)、豪尔赫·森普伦的小说《二十年与一天》(2003)等5部小说为例,分析了不同的叙述模式及意义:多视角见证式的回忆让读者看到战争带给人类的罪恶;“家族”构成的回忆空间清晰展示了未曾经历内战的后代们如何看待前人无法言说的战争记忆,以及重获这段记忆对于他们重新审视自我并真正获得历史归属感的重要性。此外,2011年由法国司汤

达·格勒诺布尔大学教授乔治·提拉斯主编的《当代西班牙小说新航向》(*Nuevos derroteros de la narrativa española actual*)一书中也独辟一章对内战题材的回忆小说进行了专门研究,例如:阿尔穆德纳·格兰德斯在历史小说《冰冷的心》(2007)中运用交际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工作原理,使内战中的战败方重新获得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本杰明·普拉多在《行走的坏人》(2006)中通过侦探式的调查和走访将西班牙内战期间骇人听闻的儿童偷窃案件重新拉进人们的视野,展现出以他为代表的年轻一代作家不轻言遗忘,以及对于民族历史批判、审视的态度,等等。除专著以外,近二十年来,相关高质量的学术文章、论文集、博士论文等不胜枚举,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如同“记忆”从“历史”中分离出来一般,渐渐地,学界将这些催生了一种记忆文化现象的叙事,从历史小说的类别下独立出来,将其称为“记忆小说”<sup>①</sup>。由于“记忆”固有的流动性、碎片化的特性,以及其自身运行过程中随时发生的选择、重构、遗忘等行为,在对以西班牙内战为回忆对象的“记忆小说”进行研究时,我们的重心已经不在于追问:回忆究竟有多真实?而是专注于文本如何通过艺术化的构造,消解了事实与叙事的中间地带,使自身成为新的象征意义上的“记忆之地”;同时,通过这类文学在建构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的过程中的批判和反思,来审视和考察当今西班牙知识分子,乃至整个社会的历史观、价值观和记忆观。

因此,本书共分为七章,并按照递进的研究顺序分为“概观”和“见证”两个部分。上篇的第一章是对与记忆研究相关的重要概念的梳理和关系厘清。从“历史”和“记忆”的关系入手,以20世纪记忆研究发展的几个重要节点:集体记忆、“记忆之场”和文化记忆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为主要线索,探寻普遍意义上的历史、记忆和文学文本在文化记

---

<sup>①</sup> 关于“记忆小说”的概念界定,请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内战记忆小说的概念界定与再现模式”中的相关论述。